

评论

代表提意见不是“自娱自乐”

奚旭初

3月9日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时候,全国人大代表、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提出意见:“我是老代表了,可每次审议政府工作报告,审查预算报告,都看不到具体职能部门的人。”谢子龙说,感觉某种程度上人大代表是在自娱自乐。(3月10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有此意见的代表大有人在。就在昨天上海代表团分组审议时,林荫茂等代表就提出,政府部门应派人到现场听会,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,认真听取代表的审议意见,不能让代表提意见变成“自娱自乐”的呼吁,极具实际意义。代表铁肩担责任,发议论谏言,抒真知灼见,“好声音”响彻人民大会堂。代表中,有很多相关领域专业人士,他们在一些热点话题、社会现象上有着很大发言权。而这些代表人民群众的呼声、意见会不会得到重视,问题会不会解决,其重要标志是政府职能部门是否能够倾听,及时予以回应,因此政府部门理应贴近两会,与代表进行互动。

不少议论热烈的焦点问题,无论是代表还是媒体、公众都想及时知道政府部门的意见,但一些职能部门缺少了主动、及时回应,代表“好声音”基本

都以议案等形式留到会后办理。代表希望政府部门到现场听会,双方有面对面的交流沟通。互动中代表问的是热点、难点问题,体现的是代表对政府部门的监督,本质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监督管理。另一方面,互动不仅是一事一问,一问一答,就事论事;其更大的意义,是通过质询与答复,不仅可以更好地倾听民声、反映民意、集中民智,而且对于加强监督,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,都是有利的推进。

在加强代表委员与政府部门互动这件事情上,一些地方已有很多探索和经验。在地方两会上,不论人代会还是政协会议,都有各委办局在现场“摆摊”,代表委员可以就专门的话题,与政府部门坐在一起,直面审议。期待国家各部委都到两会现场“摆摊”,这必是民主政治的又一动人风景。

微评论

央企高管不能只谈收入不讲贡献

王震

中石化茂名石油化工公司总经理余夕志说,“我们是中国第一大、世界第五大,但是老板的工资只80多万元。吓到了吧?”他认为“社会上普遍认为石油行业收入高,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。”(3月10日《新快报》)

中石化老板年薪80万,无论在民企还是央企,确实都不算高,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2007年就已达6616万元了。不过,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指出的那样,国企的利润很高,是因为它很多税不交、能够得到低于市场价格的贷款、能够免费使用公共资源、或者低效的使用,也就是说,大部分央企赚钱,不见得是掌舵人经营能力强,而是“共和国长子”这个身份占尽了便宜。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,80万的年薪是不是已经很高了?正如人们所质疑的,目前央企最大的问题,是只顾拿高薪,而忘了自己的出处。央企利润大,交税少,交给国家的利润就更少,有时反而还需要财政来补贴。这种不符合市场精神的情况,是一定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,以央企高管高收入为代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,必然要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手术刀,以逐渐缩小贫富差距。

时事乱炖

一年1068个会有多少是白开的

钱凤伟

毋庸置疑,一年1068个会,多半就是这样的形式大于内容。换言之,这样的会议,不过是空耗时间和精力,乃至不菲的会议经费,而效果其实是开了也白开。不仅如此,这样的会议,还有可能延误工作,助长不实之风,乃至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。

由于会议的泛滥已是积重难返,现在许多地方出台硬性的规定,比如设立“无会周”甚至“无会月”,以精简会议。一大批会议因此被砍掉,而能够被砍掉的会议,当然肯定是可开可不开的会,这也足以证明,以前的许多会议,都是白开的。

事实上,如此硬性地精简会议,让官员对剩下的会议加倍珍惜,因此自觉地挤掉其中的套话、空话、废话,开成精干、有质量的会议。而许多为会议所困的干部也因此腾出了时间,有利于到基层、到一线去抓工作的落实,去解决具体问题。



@新华视点:【一位厅级干部的会海人生】去年一年1068个会,还不包括自己单位内部召集的。当沿海某省厅级机关一把手把这个数字公布时,当地省委书记都很吃惊。(3月10日《新民晚报》)

时评

80后北漂者的青春谁做主?

钱兆成

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说出一些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的现象并不少见,一是满足成功人士自身的心理需求;二是成功人士有更为充分的话语权,说出口来掷地有声,的确能够影响一些人的价值取向。

不过正如一个硬币有着不同的两面,有一种偏向性的声音,自然还会有另一种不同的声音。宗庆后论断的立足点是“尊重”二字,然而笔者同样可以就“尊重”二字展开分析,以权之矛攻其之盾。

首先,北漂者未必真的喜欢在北京漂着,80后回家乡去,也未必会受到尊重,相反的,长久以来我们心中都有一种“攀高枝”心态。同样一份保安工作,如果在省城或者首都政府部门干,也比在县城工作更易受到尊重。这些80后父母们也不会详细提起自己儿女的真实处境,只是似是而非地提到某某部门的名称,羡慕的眼光早已经聚拢过来。我们可以指责这是一种不理智的心态,但事实总是如此,不容许你做过多辩解和分析。相反的,一个人早早地在二三线城市定居,从小看着“他”长大的人们未必会尊重他们。

另外,抛开世俗的观念,受人尊重是不应该分地域的,敬人者人才敬之,你敬我一尺,我敬你一丈,这

样的道理从表面上看是如此的顺理成章。消除地域观念后,我们会发现鱼儿有遨游水中的自由,也会有鲤鱼跳龙门的那一刻,有比较才会有选择。

从生活成本角度出发,小地方的生活成本是比较低,但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,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。小地方的工作选择也难以有大城市那般丰富,有时候在小地方的心累也可能超过大城市的身累。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,重新回到二、三线城市的“都市人”,感觉又跳进了一个“围城”。

年轻人“逃回北上广”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。在一线城市,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,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的文化基础设施,也在于大城市充满机会并且有着相对的公平,能够承载更多人的精神追求。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,以免沉陷精神荒漠。

当然,现实问题依然存在,房价依然很高、生活成本依然很大,而每一个人都会权衡自身的利弊得失,以作出对自身最为有利的选择。由此,北漂更多的是一种心态,尊重别人的选择才是对他人最大的尊重。

“前腐后继”胆量缘于“飞机失事率”?

宜人

假如要评选“前腐后继”的典型案例,河南省交通厅定会榜上有名。

1997年10月,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,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。不到4年,2001年3月,曾锦城的继任者张昆桐又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2006年8月,这个省第三任交通厅厅长石亮亮因犯受贿罪,判处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2011年12月,河南省检察院对第四任交通厅厅长董永安立案侦查。董被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,非法收受他人现金1631万元人民币及其他财物,涉嫌受贿罪。

按理说,在同一个部门里,前任翻车,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,不太会重蹈覆辙。谁知先后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,居然如此不遵守“交通规则”,连续出现“交通事故”,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,一个比一个更贪!

四任交通厅厅长为何会“前腐后继”?有一个“坐飞机理论”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。人们都很清楚,坐飞机有一定危险,全世界每年都有一两架飞机掉下来,而飞机失事,乘客幸存的几率很小。那么为什么许多人还是要选择坐飞机呢?这是因为飞机失事率很低,遭遇一次飞机失事的概率是几千万分之一。同样,如果因为贪腐被抓的几率跟坐飞机的失事率差不多,那么官员们就会心存侥幸,总觉得不会轮到自己头上。据说在香港,如果你想贪污的话,保证有60%的机会抓到你,看你敢不敢贪!反腐败,就是要想办法让公职人员不想贪,不能贪,不敢贪,其中关键就是要不敢贪,贪了就会被捉,身败名裂,得不偿失。

非常道

她像个骄傲的女学生,背着心爱的作文,这篇作文触碰的是极严肃的主题,这产生了化学反应,勾兑得大家又轻松又过瘾,也发人深省。

3月8日上午9时,全国政协委员、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脱稿发言《如何避免“八项规定”一阵风》,不到1000字收获了13次掌声。白岩松在微博上评价。

“一般领导来开会都是司机把车停在门口,领导开完会直接坐车离开。在叶青看来,这体现的是当下的官场文化。”

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被安排到省政府去讲课,由于叶青未开车而是骑着自行车,警卫将其拦在大门外。